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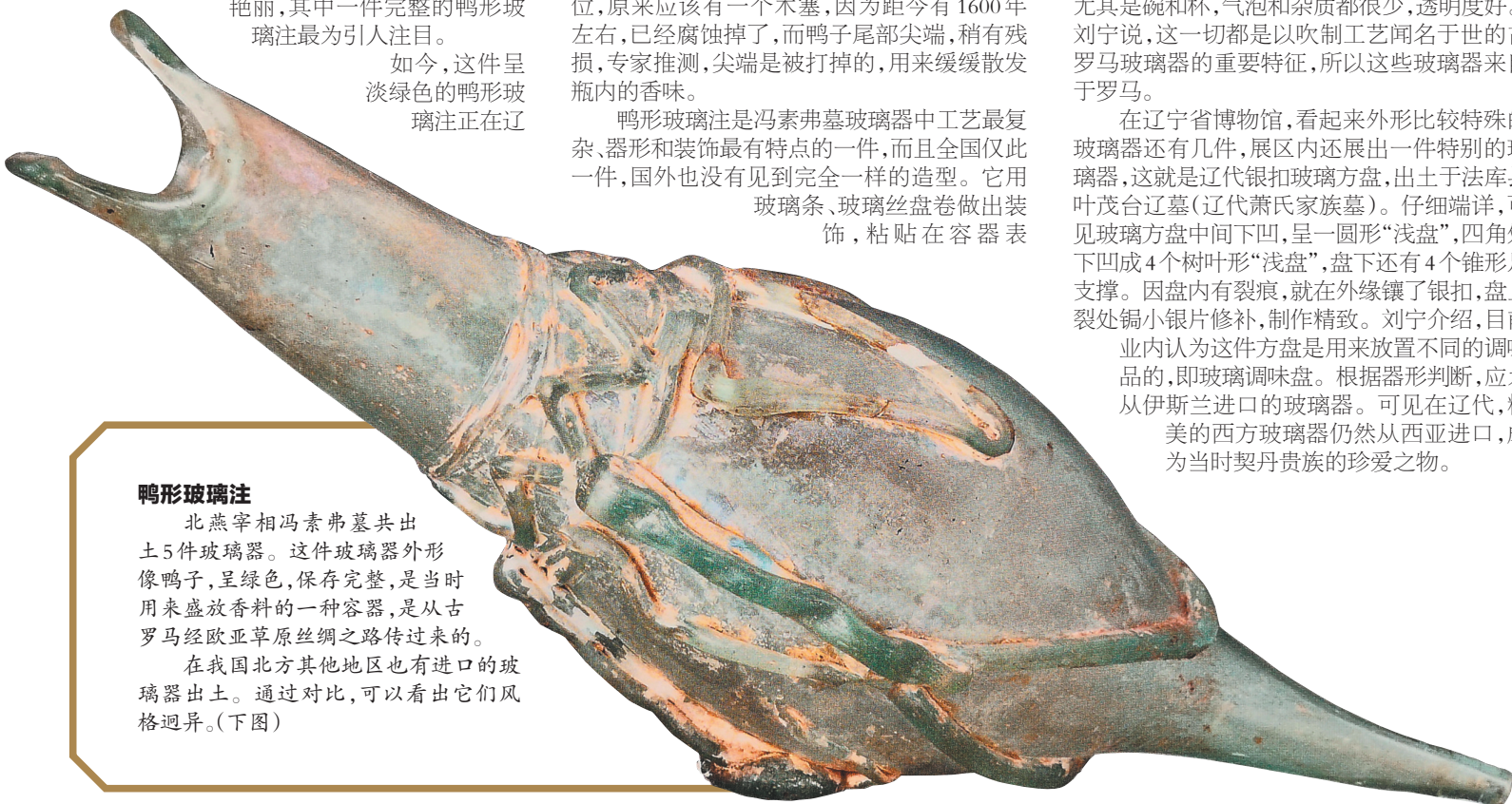
一条草原丝路连接东西文化

冯素弗墓出土五件古罗马玻璃器，见证——

本报记者 商 越 文并摄

1965年，朝阳市北票市西官营镇西官营村意外发现一座古墓。经考古发掘，古墓出土了470多件文物，其中有4枚龟钮印章。据当年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冯永谦回忆，根据印章，大家一致认定，墓主人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北燕宰相冯素弗。墓中还出土了5件珍贵的玻璃器，包括碗、杯、钵等，都是晶莹剔透、色彩艳丽，其中一件完整的鸭形玻璃注最为引人注目。

如今，这件呈淡绿色的鸭形玻璃注正在辽



鸭形玻璃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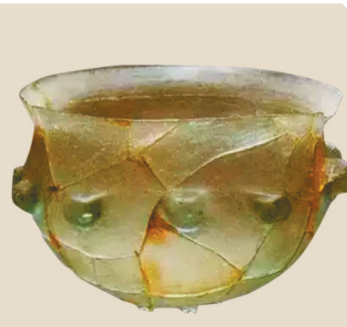
北燕宰相冯素弗墓共出土5件玻璃器。这件玻璃器外形像鸭子，呈绿色，保存完整，是当时用来盛放香料的一种容器，是从古罗马经欧亚草原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在我国北方其他地区也有进口的玻璃器出土。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它们风格迥异。(下图)



宁夏出土的珊瑚玻璃碗。



山西出土的玻璃碗。



北京出土的珊瑚乳突玻璃碗。



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杯。

战国中晚期我国开始制造玻璃

“玻璃，在文献中一般称为琉璃、颇黎等，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可以发现，我国一直存在着进口和国产两类不同系统的玻璃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卢治萍告诉记者，国产玻璃器要追溯到春秋末战国初，当时西亚玻璃珠饰传到我国中原地区。在其影响下，至战国中晚期，我国已经能够制造外观上与西亚相似而成分不同的玻璃珠，并很快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追求仿玉效果，采用与金属成型工艺相似的铸造法制作。

“隋唐时期是中国玻璃制造的中兴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刘宁说，隋唐两代辽阔的疆域、富足的国力、频繁的对交流、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围，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国产玻璃在此时得到较大发展，生产出一批精美的玻璃器。

学者夏文峰在《中国古代玻璃器》中记载，隋代时，玻璃吹制技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唐代时，玻璃器型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新器型有茶碗、茶托、空心玻璃珠及佛像等。玻璃色彩也更为丰富，除蓝色、绿色、淡绿、黄绿色外，又出

现了乳白、黄色、棕色等新颜色。装饰手法上也更加多元化。如陕西临潼出土的唐代玻璃网纹瓶上装饰凸起的网格纹，就是采用了二次贴塑的工艺方法，既富有中国传统特色，又充满浓厚的波斯风格。

到晚唐时，呈现出国产玻璃与进口玻璃共存的特点。配有玻璃装饰品的发饰较为流行，此时的玻璃器仍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多为皇室贵族与重臣所有。同时，萨珊风格的磨花玻璃与伊斯兰风格的刻花玻璃器，仍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到中国，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

随着各地早期玻璃器的陆续出土，考古人员对器形、纹饰、工艺及成分进行研究比较，发现了国产和进口玻璃器存在很大差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认为，国产玻璃器的器形有我国的传统特征，在同时期的陶瓷器或漆器中可以见到相似器形，而且这类玻璃工艺自成体系，有继承发展的关系，成分属于铅钨玻璃。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2件玻璃耳杯和1件玻璃盘，是迄今发现

较早的国产玻璃器，都为翠绿色，晶莹如玉。而玻璃盘和耳杯的制作方法，与当时大量生产的玻璃壁、玻璃带钩相同，都是铸造法，只是工艺上更复杂一些，成型后通体打磨。

相比之下，进口玻璃器大多透明度高、轻巧别致，以容器尤其是饮食器具为多，其器形在我国出土物中罕见。可以看出，进口玻璃器与同时期的中国器物在器形和工艺上没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当时进口玻璃器非常珍贵，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卢治萍说，河南洛阳东汉墓出土的缠丝玻璃瓶等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从两汉时期就进口罗马玻璃器。西方玻璃器大量东运，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统治阶级奢侈斗富，将西方进口玻璃器作为彰显身份和财富的宝物。如《洛阳伽蓝记》载，北魏首富、河间王元琛在一次大会宗室时，显摆自己的宝器夸富：“金瓶银瓮百余口，匳簠盘盒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厄数十枚，做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上层社会对域外玻璃器的青睐。

北方游牧民族起推动作用

一条途经欧亚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欧亚草原地带的东端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西端连着西亚、欧洲，这条中高纬度的草原带上，常年居住着游牧民族，他们随着游牧生活而迁移，更有利于东西文化传播和商品贸易交流。

这条草原通道自古有就，至5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原丝路以平城(山西大同)为中心，西接伊吾(新疆哈密)，东至龙城(今朝阳市)、辽东城(辽宁辽阳)，经朝鲜而至日本，逐渐发展形成了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要道，是连接西亚、中亚与东北亚的重要国际草原路线，而龙城是连接草原丝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重要环节，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发现的罗

马玻璃器，就是通过这条横贯中国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传播过去的。

“具体到冯素弗墓出土的这5件古罗马玻璃器的来源，应是从事草原汗国柔然带入北燕的。”刘宁认为，柔然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主要活动于4世纪末到6世纪中叶。

刘宁分析，这批古罗马玻璃器，可能由里海南岸一个重要城市——和椌城(今伊朗达姆甘)出发，沿里海南岸一路向东北，到高车(今哈萨克斯坦，汉时属大月氏境内)，通过柔然的地域，经黑山进入北燕。

“在这条草原丝绸之路之上，辽宁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而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碰撞、融合、升华，离不开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推动作用。”刘宁说。

考古发现，这种“从西域而来”的进口玻璃器，在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均有出土，如广州西汉中期墓出土的3件玻璃碗，南京象山七号东晋墓出土的一件磨花筒形杯，南北朝墓葬出土的罗马玻璃器更为集中。那么，冯素弗墓出土的这批玻璃器是怎么从遥远的罗马来到辽河流域的呢？考古学家们认为，谜底就是横贯欧亚的那条草原丝绸之路。

刘宁介绍，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共有4条：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其中丝绸之路的主道是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开通的长安(陕西西安)经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至中亚、西亚的商道，称为沙漠丝绸之路。但在沙漠丝绸之路尚未开通前，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早已存在



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碗。



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银扣玻璃方盘。



辽墓出土的伊斯兰风格玻璃杯。

手记

“玻璃”一词的来源

本报记者 商 越

使中国玻璃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清官玻璃厂也带动了民间玻璃技术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因此清代的玻璃器不但质优量多、工艺高超，而且颜色绚丽多彩、造型推陈出新，是中国传统玻璃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史料记载，从康熙皇帝传谕设厂生

产玻璃以来，清官玻璃厂的生产几乎没有间断过，包括典章用品、室内陈设、门房用具、装饰品和鼻烟壶等。到了清雍正时期，还用几种玻璃制品来代替宝石，并正式列入典章制度，如用于官员所戴的帽顶，三品官以蓝色明玻璃代替蓝宝石帽顶，五品官以白色明玻璃代替水晶

帽顶等等。200多年中，玻璃厂制造了大量玻璃器皿。

有趣的是，玻璃在中国的使用历史悠久，但称为“玻璃”的时间却很短，一般称为琉璃、颇黎等。直到清代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生产的产品被官方称为玻璃，民间才开始普及。

据玻璃史学者夏文峰考证，在我国历史上，明代之前，玻璃器的身价甚至高于黄金。到了明代，因为达官贵人不喜欢玻璃器，此时玻璃器的发展进入衰落期，玻璃制造者不得不降低成本、增加产量，玻璃制品开始销往民间，所以制作工艺、质量比宋元时期有所下降。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